学术动态

“盛清社会与扬州”学术研讨会综述

常建华

由著名清史学者陈捷先、冯尔康、阎崇年共同发起，扬州市政府主办，南开大学、北京社科院、扬州大学等单位协办的“盛清社会与扬州”高端学术研讨会，于 2010 年 10 月 23—24 日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四十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或摘要。会议进行了两场大会报告以及四组分组报告，分组报告围绕社会生活、社会治理、思想与学术、多面扬州四个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

研讨会的开幕式兼作《清宫扬州御档》首发式，这部 18 册的资料集由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扬州市档案部门、扬州大学编辑，从 9000 多件相关档案中遴选出 5700 多件珍贵史料汇编而成，列入国家清史编委会的项目，国家清史编委会朱诚如副主任、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胡旺林、江苏省档案局副局长毕小平以及扬州市领导袁秋年、王玉新、董玉海出席了首发式与开幕式。

会议主题中的“盛清”主要是指十八世纪的清朝，所谓“社会”也取广义之意，十八世纪的扬州处于鼎盛时期，与会学者热烈讨论了盛清社会与扬州的相关问题。以下根据提交会议的论文或摘要，做一学术综述。

一、政治统治与社会生活

扬州在历史上有过两次繁盛时期，一个是唐代，另一个是清代。清代扬州的繁华与清廷对扬州的重视有关，学者首先将目光投向清廷与扬州的关系。陈捷先（台湾大学）《雍正与酒——兼谈雍正禁酒与扬州》认为，雍正对酒的态度似乎也有意识或不自觉的反应了儒法两家的文化理念，他既不以清教徒的方式叫人完全戒酒，也不站在道家那样以酒要求生命自由狂放的一边，他是采取中庸之道的。雍正朝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彻底禁酒，所以民间酒肆依然林立，扬州就是如此。庄吉发（台北故宫博物院）《翠华南幸扬州写真——盛清君臣眼中的扬州》以康熙皇帝南巡御书留题为中心，探讨康熙皇帝赏赐御书的政治文化意义。认为君臣之间互动良好，有助于政治生命共同体的形成。扬州以盐闻名，清朝在此设置的盐务官发挥了重要作用，杜家骥（南开大学）《清代扬州的盐务官》详细考察了两淮盐区的专职盐务官以及盐运司分司官。岑大利（中央党校）《乾隆帝南巡与扬州》论述了四个问题：乾隆帝南巡至扬州，扬州盐商对乾隆南巡的贡献，乾隆帝对扬州盐商的褒奖，南巡对扬州城市发展的影响。韩小敏（美国杨百翰大学夏威夷分校）《乾隆帝的扬州御制诗》分门别类论述这些诗歌的特色。

盛清的扬州城市繁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有关讨论较多。清代人和近现代学者认为雍乾时期，或乾嘉时期扬州最为繁华。冯尔康（南开大学）《清代乾隆时期扬州人的引领时尚》一文认为：清代扬州的兴盛，历经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二朝和嘉庆初年的一百年间，而以乾隆年间为鼎盛。并指出，扬州人追求高

［收稿日期］2010－09－20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071

雅生活的精神，相关事业的传统，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可以借鉴，作为今日建设文化教育名城的资源。常建华（南开大学）以《扬州画舫录》为例，发表《盛清扬州的城市生活》一文，论述了清前期的扬州城市空间，园林与城市生活，食衣住行，画舫与游乐，戏曲欣赏，文人雅集与文物鉴赏等。王跃生（中国社科院）通过清代乾隆和嘉庆时期的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婚姻家庭类）档案，考察清朝中期扬州及其所辖地区民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为人们理解当时扬州民众的基本生存环境、水平和方式提供参考。张仁善（南京大学）《盛清扬州的生活风尚——传统礼法松弛的先导》认为，盛清时期的扬州，生活风尚力求新潮，几可引领全国，并逐渐滥觞成全国普遍趋势；该风尚体现出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更新，直接冲击传统礼法藩篱，成为传统礼法松弛的风向标。余新忠（南开大学）《盛清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活》主要依据焦循撰《李翁医记》，记述其医技、医德和医疗经历。为我们了解这位扬州名医的医疗生活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周正庆（暨南大学）《十七世纪民间天道观研究——基于〈广东新语〉的研读》以卷一至卷六的天、地、山、水、石、神等六语作为重点对屈大均的天道观进行分析。宫宝利（天津师大）《清代术数活动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认为，由于术数活动已经与清人家庭生活融为一体，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致使家庭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均受到术数活动的左右，人们的生活范围和自由受到限制。在术数活动的作用下，清人家庭关系充满了猜忌与紧张，并影响到清人的情感与性格。

二、扬州文化

清代扬州文化引人注目，学术流派有扬州学派，物质文化繁荣，戏曲演出全国闻名，书法绘画以及文物鉴赏等一时极盛。阎崇年（北京社科院）《盛清社会与扬州文化》以扬州文化的三件事例——康熙朝编修《全唐诗集》、雍正朝蒋衡书写“十三经”和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为主，探讨了盛清社会与扬州文化的关系。长期研究扬州地方文化的学者韦明铧（扬州市扬州文化研究所）《技术·艺术·学术——论清代扬州文化的三个层面》认为，清代扬州文化，约有三个特点：一是不惜工本，臻于极致；二是取人之长，化为己有；三是融会贯通，独树一帜。

从新角度认识扬州文化的有扬州大学的两位学者。朱季康《新文化史学视野下的“盛清扬州”》指出，康乾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前进转向停滞的一个阶段，在物质、制度、观念三个文化层次上保守不前，体现在扬州这一康乾盛世的代表城市，其城市文化的百年变迁则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即城市经济发展的政治化因素、市民群体的成长、扬州城市精神的蜕变与城市文化的惯性。认为对奢靡生活的追求与思想上的保守，自乾隆时期成为扬州市民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并随着近代扬州城市的没落而愈发强化。黄俶成《论18世纪扬州盐商和文化市场在世界经济文化进程中的地位》，则从更广阔的视野论述扬州文化，认为动关国计的巨大产业，独步一时的辉煌文化，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仍需本土找出路。

扬州盐商竞相营造园林并热衷于“琴棋书画”艺术活动，学界有关琴、书、画的研究较多，而棋的探讨付之阙如，顾盼（台湾成功大学）《清代扬州围棋的发展与东传》论述了清代扬州的围棋活动，中日的围棋交流，中国重要棋书的整理。作者指出，清初至乾隆年间是中国围棋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当时棋手在瘦西湖画舫中弈棋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风气。台北故宫藏有《石涛写竹通景十二轴》，王耀庭（台北故宫博物院）《盛清扬州绘画表述——以石涛写竹通景屏为例》认为，这一大画屏俨然一处经心布置的庭园。王丹（中国人民大学）《盛清扬州戏曲》探讨了盐商对戏曲的推动，诸如康、乾下江南，江春与春台班，乾隆时期，花、雅争胜，徽商与徽班等问题。

在思想与学术方面。张江珊（扬州大学）《王念孙与刘台拱校勘思想评析》认为，二人校勘思想重视对校之法，以求公允；博学多才，擅长理证。黄静（安徽大学）《浅谈刘师培家族伦理改良思想》指出，刘师培追求绝

对平等，完全根除家庭伦理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理想化特征。

在郑板桥的思想与信仰研究方面，陈进传（佛光大学）《郑板桥对佛教的态度》一文指出，郑板桥与佛教渊源深厚，虽常寄居寺院，但他并未归宗佛教，却又做了很多维护佛教的事情，诗文中也善用佛教的词汇典故，所以郑板桥对佛教的态度是“无佛之佛”。吴建华（苏州大学）《中国社会思想视野中的“难得糊涂”和“郑板桥现象”》认为，郑板桥的社会思想至少集中体现在社会平等观、社会批判思想、社会治理思想三个方面，反映清代“盛世”时期扬州与其他地区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板桥深刻的社会观察意识、批判能力，以及他理想的社会目标、社会治理的实践活动，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扬州档案的出版，为清代扬州研究注入了活力。刘耿生（中国人民大学）《清代扬州学者考据档案文献的历史贡献》论述了乾嘉考据学中的扬州学派及扬州学派的学术成就。郭美兰（第一历史档案馆）评述了《清宫扬州御档选编》的特点，认为该档选题符合社会需要，切中研究热点；弥补过去研究工作中缺少清代官方史料之不足；选材广泛，绝大部分为首次面世，史料价值可观；内容丰富，基本上能反映清代扬州历史发展的脉络，利于全面研究；有助揭示历史之谜，还原本真，再现清代古城扬州历史文化。

三、扬州的盛衰及其他

周新国（扬州大学）《略论清代扬州繁华与衰落》认为，扬州的衰落原因在于盐业经济的衰败影响，交通优势的丧失，战争对城市经济社会的摧残。刘石吉（台北中研院）《略论清代市镇的兴衰消长——兼以扬州邵伯镇为例证》论述了清代水运交通与市镇兴衰大势，并以运河港市——邵伯镇为个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振忠（复旦大学）《盛清时代的徽州与扬州》论述了盛清时代徽商在扬州的活动，提出关于徽商与扬州关系的研究，今后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资料方面，应充分发掘新的文献史料，以扩大扬州研究的史料来源。除了《扬州画舫录》、《两淮盐法志》以及徽、扬二地的方志之外，对于明清文集、徽商族谱和徽州文书的广泛发掘和利用，应是未来深入研究需要着力的重点；二是研究内容，可将《扬州画舫录》等的记载，与徽州的乡土文献比照而观，作更为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尹章义（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清代在台湾任官的扬州人》指出，台湾地方志的星野中将台湾划属于扬州，并爬梳史料，考察了清代20位扬州人在台湾的任官情况。何庄（中国人民大学）《扬州二十四桥考证》认为，二十四桥的史实从唐宋到明清，经历了一个由多变少的过程。隋唐时期扬州桥梁众多，经过战乱，到了北宋，数目减少。从唐代和北宋的诗歌可以明显地发现，诗歌中的二十四桥泛指多数，而南宋以降，多指一桥。说明金兵南下，扬州被毁，原有的二十四桥，也许只剩一座了，所以清代的各种官私记载，均指一桥。冯尔健（中国科学院）《年年红药为谁开——温史话扬州》强调古代扬州特点有二：一是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容易繁荣；二是在抵御外族侵略时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

政治方面，赖福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清代礼权典型：罪己诏》指出，清代皇帝从未入关既已有罪己诏书，直至灭亡为止，共得200多件，若以朝代论，是中国历代之中最多者。偌大的数量，多由皇帝主动下诏，少数为臣子上奏。作者还就清代罪己诏形式与类别探讨，分析罪己诏颁下后的效果。柏桦（南开大学）《明清州县官的陋规》指出，明清陋规的种类繁多，许多都是法律认可的，但滥收陋规与贪污受贿没有明确的界限，州县官个人收入与行政费用没有明显区别，也就使陋规成为朝廷惩治贪污受贿的重点，更成为官吏的重要收入来源。陈龙贵（台北故宫博物院）《试析雍正乾隆父子对待宗族的差异》论述了从雍正帝扶持、利用宗族力量到乾隆帝抑制强宗豪族的不同。

十年前在北京的中国嘉德拍卖会拍出雍正立像，对于该像学者有不同看法。吴美凤（台北科技大学）《清世宗朝服立像探讨》推敲清代朝服立像产生的可能性，并在画作技巧、绘画表现方面，对相关图像交叉比对，再

从雍正、乾隆等有清一代之政治氛围与雍正立像互为比对，最后试图推测该立像可能的画家及其成画时代。刘毅（南开大学）《清朝盛世时期的官窑》指出，扬州与景德镇及其出产的正色、次色官窑瓷器有着密切关联。

陈旺城、段昌国（台北佛光大学）《论清代乾嘉道三朝的回疆边政》一文，论述了军府统治下的换防兵制、伯克制度、汉回隔离政策、垦务与牧政。河仙（Ha Tien）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南半岛越南的南端、暹罗湾、湄公河三角洲下游的江海交汇、水路交通的濒海地带，历史上曾经是扶南古国、吴哥王朝的疆土、南海海洋贸易带的重要港口。明清易代之际，1671 年广东雷州海康人鄚玖（Mac Cuu）在河仙地区建立起以华人为主体、颇有影响的政权，李庆新（广东社科院）《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与清朝关系述略》探讨了鼎盛时期的河仙政权（港口国）与清朝、暹罗等国关系，指出 17—18 世纪的中南半岛并不和平，广东雷州人鄚氏建立了河仙政权，潮州人郑昭建立起暹罗大城王朝，两个华人政权左右了中南半岛局势，这是东南亚史与华侨华人史上的重大事件。两个华人政权互相混战，接踵而消亡，清朝似乎坐视不理，颇令后世治史者感慨不已。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收获集中起来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表现在新领域、新问题的开发上。扬州研究较有学术传统，近十几年来冯尔康等主编《扬州研究：江都陈轶群百龄冥诞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96）集中反映了扬州研究的学术成果。有三部博士论文讨论清代扬州：国内有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 1996）；国外有美国学者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 年的一座中国城市》（北京：中华书局 2007）。可以说，扬州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性学术领域，研究起点较高。这次研讨会关注“盛清社会”，学者的选题比较集中在日常生活与城市史，同时受到文化史的影响，社会文化史的色彩较为浓厚。

其次，强调新史料的发掘。近年来有关扬州的档案资料陆续公布，如《清宫扬州御档选编》，为研究注入活力，本次会议中王跃生的论文就是依据档案资料，发现不少扬州社会生活的细节。王振忠展示了新发现的数种文献，余新忠发现新的资料探讨医疗社会史。特别是《清宫扬州御档》问世，必将推动扬州研究。可以预料，扬州研究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冯尔康教授认为可以考虑提出“扬州学”的概念。

再次，扬州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扬州以繁荣的商品经济、繁华的城市消费生活出现在中国大地，她的存在构成了一道另类的风景线。在迅速城市化、进入小康社会的当代中国，人们开始了新生活，如何看待传统中国的“现代性”，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提供了历史性的认识。新时期扬州市提出了建设“创新中国、精致扬州、幸福扬州”的城市建设思路，这一口号基于扬州的传统城市文化，具有历史依据。扬州的研究不仅是对于扬州，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